

# 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赢得未来

迟福林

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通过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激发了市场活力与经济活力：实现了 GDP 年均 9.5%、人均 GDP 年均 8.5% 的增长，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由 1.8% 上升至 15%；2013 - 2017 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年均贡献率超过 30%。实践证明，“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

当前，我国走向高质量发展面临着内外环境重大变化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今天，总结改革开放 40 年的基本实践，不是为了彰显过去，而是为了实现新阶段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突破，以赢得国际竞争合作与国内稳定发展的主动。

我国开始进入工业化后期，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关键在于改善实体经济发展的环境

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成功实现从工业化前期到工业化后期的历史性跨越，主要得益于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点的市场化改革；得益于打开国门积极

融入全球市场。当前，我国开始进入工业化后期，能否推进以实体经济发展为重点的制造业转型升级，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挑战。

以产权保护为重点强化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保障。民营经济的发展是改革开放 40 年的重大成果，是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体力量。当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突出矛盾在于民营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加大，有些民营企业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严重困难。这种状况不尽快改变，制造业转型升级就难以突破，经济增长就很难稳住，高质量发展也就很难推进。对此，既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政策与举措，应对民营经济面临的困难与危机。更需要抓紧研究制定一部《民营经济促进法》，奠定民营经济稳定发展的法治保障基础。

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为重点重塑“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过去 40 年，“中国制造”依托低成本优势快速崛起；今天，“中国制造”的低要素成本优势正在逐步减弱。“中国制造”要重塑新的综合成本优势，关键在于通过系统性制度变革着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一是着力大幅

降低民营企业税收负担、社保费用负担，以支持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活下去”；二是着力解决与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相匹配的普惠金融问题，降低民营企业融资成本；三是着力破除能源、交通等领域的垄断格局和利益藩篱，为民营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以激活创新要素为重点发展中高端制造业。当前，制造业向服务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的趋势明显，由此对创新的依赖性全面增强。我国拥有世界第一的人才规模和世界第二的研发投入，但受某些体制政策因素的束缚，人才规模和研发投入规模优势还难以充分转化为自主创新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科技成果转化 30% 左右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的 60%—70% 相比，差距甚大。这就迫切需要把提高科技要素配置的市场化程度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推动科研领域的“小岗村”改革；迫切需要采取员工持股等多种形式激励科技创新，建立科技成果转化的有效激励机制；迫切需要鼓励科研机构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形成以科研为中心的创新管理新体制和激励创新

的新机制；迫切需要推动教育的“二次改革”，推动开放型、创新型教育发展的实质突破。

我国开始进入消费新时代，释放巨大内需潜力，关键在于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40 年来，我国在释放市场活力的同时，注重协调利益关系和增强改革普惠性，实现了从短缺经济社会到消费新时代的历史性提升。进入消费新时代，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正由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转型升级，并蕴藏着巨大的内需潜力。预计到 2020 年，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比重将由目前的 45% 左右提高到 50% 左右。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深化结构性改革，既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满足全社会服务型消费需求的重大举措，也是把巨大内需潜力转化为产业变革新优势的关键所在。

把服务业市场开放作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在服务型消费快速增长的条件下，预计到 2020 年，我国居民消费需求规模将由 2017 年的 37 万亿元增长到 48—50 万亿元。我国日益扩大的巨大消费潜力是未来 10 年保持 6% 左右增长的重要基础。问题在于，由于服务业市场开放滞后，服务型消费“有需求、缺供给”的矛盾相当突出。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大

趋势，关键是以服务业市场开放释放市场化改革的新红利：打破服务业领域的行政垄断与市场垄断，推动服务业向社会资本全面开放；推动服务业领域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形成市场决定服务价格的新机制。

在政府保基本的前提下，公共服务领域要放开市场、引入竞争。教育、健康、养老、文化、体育等服务型消费都是消费升级的热点领域，都带有公共服务的属性。在消费个性化、差异化、多元化的今天，推动这些服务领域的市场放开，可以创造巨大的细分市场，成为新的增长点。为此，在突出强调政府保基本公共服务的同时，公共服务领域要尽快、尽量引入竞争，优化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在公共服务领域的供给环节，引入竞争性供给主体，形成多元供给主体、多元主体竞争的新格局；改革和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政策体系，尽快扩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范围，以降低成本，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效率。

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重点加快利益结构调整。2020-2035 年是我国由中高收入阶段迈进高收入阶段的关键时期，中等收入群体比例需要从目前的 30% 左右提高到 50% 以上。为此，要把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重点的分配制度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任务，并形成推进改革的行动路线。例如：推行员工持股，

使部分产业工人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在严格土地用途管制和规划管制的前提下，尽快落实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农村土地使用权长期化、物权化、资本化，推动部分农民成为中等收入者；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防止、减轻因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异常波动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大范围冲击。

我国开始进入对外开放新阶段，应对经济全球化新变局，需要坚定推进以自由贸易为主线的全面开放

40 年来，我国抓住经济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历史机遇，坚持打开国门的基本国策，成功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今天，经济转型升级蕴藏着的巨大内需潜力成为我国融入全球经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突出优势和最大本钱。立足近 14 亿人的内需大市场，保持战略定力，“以高水平的开放倒逼高难度的改革”，我国就有条件、有能力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挑战。

建立与主动扩大进口相适应的制度与政策体系。过去几年，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进口结构与居民消费结构脱节的情况日益突出，进口不适应城乡居民消费尤其是服务型消费的现实需求。《2018 年中国消费市场发展报告》显示，我国进口总额中，消费品比重不足 10%。未来



几年，如果消费品进口比重达到 20% 的水平，不仅会给我国消费结构升级创造市场条件，而且将给其他国家带来每年约 4000 亿美元的出口机会。以药品为例，根据财政部 2017 年最新关税税率调整，我国进口药品最惠国税率为 2%—4%，进入销售环节还需要在此基础上征收 16% 的增值税，这使得进口药品价格上升约 30% 左右。目前，大部分发达国家对药品进口增值税进行减免，欧洲的平均水平为 8.8%，有的国家为 0。建议在进一步降低关税总水平的同时，大幅降低或取消药品、常见病所使用的医疗器械进口增值税及重要日用消费品进口环节增值税；尽快实现以癌症治疗为主的医疗器械进口零关税；逐步引进欧美国家的药品质量安全标准，扩大医疗技术等服务进口，倒逼国内医药企业提高质量，以适应和满足全社会日益增长的服务型消费需求。

推进“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与服务贸易融合发展。从实

践看，以金融业为重点的服务业企业“走出去”滞后于制造业企业“走出去”，也滞后于产能合作的实际需求。2017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服务贸易额占贸易总额的比重仅为 8.2%。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要在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同时，更加注重以服务贸易合作提升产能合作水平。在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实行服务业产业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从不同区域的独特优势出发，重点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以教育、健康、医疗、旅游、文化、金融、会展为重点的服务业项下的自由贸易试点。

以服务贸易为重点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例如：以服务贸易为重点促进国内自贸试验区转型升级，不断创新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更大范围扩大服务业市场开放；加快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进程，着力实现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体制无缝对接的突破；以服务贸易为重点，以服务

业市场全面开放为引领，着力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探索形成海南自贸试验区服务贸易新高地。

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不亚于 40 年前。在经济转型升级与外部环境复杂深刻变化相交织的新形势下，改革与危机赛跑的特点仍然十分突出。以全面深化改革赢得主动，关键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关键是重行动、抓落实、见成效。坚定地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为主线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释放近 14 亿人的巨大内需潜力，不仅将使我国赢得未来 10 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稳定发展，也将更大程度地惠及整个世界。■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责任编辑：张莉莉